

北京鋼院

北京鋼鐵學院編印

内部发行 請勿外传 第148期 1977年4月28日



英明領袖華主席親自主持全國工業
學大慶會議開幕大會。

我們一定要
高舉毛主席
樹立的大慶
紅旗。

華國鋒
一九七七年
四月廿

英明領袖華主席給大慶油田的親筆題詞：『我們一定要
高舉毛主席樹立的大慶紅旗。』

貴 在 鼓 勁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日)

華國鋒

今天新湖南報刊載的《可貴的革命干劲》一文，介紹了毛田區的群眾和幹部在黨的領導下，鼓足革命干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出色事跡。這個區，一九六二年糧食總產量，比歷史上產量最高的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八；生豬，每戶平均存欄一點二頭；造林三萬多畝；其它生產和建設事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鞏固和發展了集體經濟。毛田區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偉大紅旗的結果，是認真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的結果，也是廣大群眾和幹部艱苦奮鬥的結果。

毛田區可貴的地方，在於他們有雄心壯志。既有遠大的理想，而又腳踏實地地去干。對於當前群眾要求辦而又能夠辦到的事情，總是以飽滿的熱情，千方百計去辦；對於長遠性的建設，也根據需要與可能的原則，積極去辦。他們在工作中，堅持黨的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把革命熱情和求實精神結合起來，把一般號召和典型示範結合起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依靠群眾的自覺來進行工作。他們在前進中遇到困難的時

候，不是畏難而退，而是敢於和困難作鬥爭，不屈不撓地去戰勝困難。在受到挫折以後，不是灰心喪氣，而是認真地總結經驗教訓，研究 and 學習別人的經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頑強地戰鬥，繼續前進。

毛田區的經驗，充分證明了：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可以依靠集体的力量，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為社會、為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財富。同時，也證明了：領導者的責任，就在於启发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帶領群眾沿着正確的方向前進。依靠群眾，發展生產，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毛田的經驗，還告訴我們：鼓干劲，必須是鼓實勁，而不是鼓虛勁、鼓蠻勁。工作應當是扎扎实實的，指標應當是積極可靠的，措施應當是切實可行的。辦事情一定要按照黨的政策，一定要反復同群眾商量，學習外地的經驗一定要結合自己的情況，不要生搬硬套。在群眾的干劲鼓起來以後，又要十分愛惜他們的積極性，十分節約地、十分有效地使用群眾的積極性。只有這樣，才能鞏固群眾的積極性，使群眾的積極

性能夠經常的保持旺盛。

毛田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出色事跡，是一篇活教材。我們应当向毛田區學習，象他們那樣，更好地鼓足革命干劲，組織生產高潮，爭取今年農業大豐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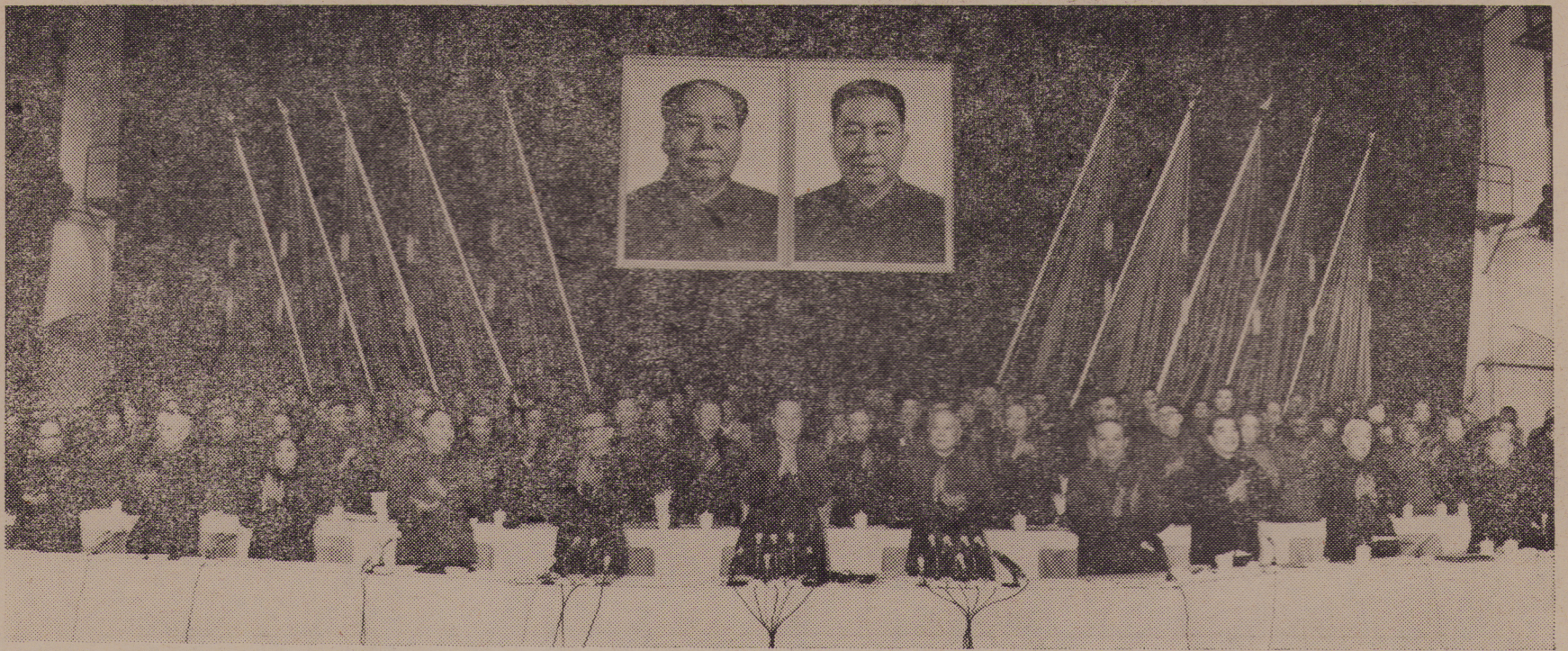
原載《新湖南報》

× × ×

英明領袖華主席一九六三年四月二日寫的重要文章《貴在鼓勁》，是學習和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典範。文章通過總結湖南省岳陽縣毛田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經驗，精辟地論述了正確路線與工作方法、領導與群眾、革命熱情與求實精神等的辯證關係。今天本報重新發表華主席的《貴在鼓勁》一文，對於推動各條戰線抓革命促生產、大干快上，對於實現華主席提出的抓綱治國的战略決策，具有極為重大的現實意義。今天本報還在第二版同時刊登毛田區委會重新學習《貴在鼓勁》的文章，供同志們參考。

——《人民日報》編者

(原載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大会主席台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开幕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李先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致开幕词。

同志们：

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现在正式开幕了。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到会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

我们这次会议，是英明领袖华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召开的。华主席亲自主持今天的大会，这对到会同志和全国工人阶级，是极大的关怀和鼓舞。

我们的会议，是在国际国内一派大好形势下召开的，是在全国人民热烈欢呼《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正式出版的大喜日子里召开的。华主席领导我们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我们党取得了又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

国的战略决策，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在这场政治大革命的推动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国民经济正在出现新的大跃进的局面。全国人民心情舒畅，意气风发，团结战斗，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到处莺歌燕舞，欣欣向荣，形势越来越好。实践雄辩地证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卓越地体现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我们的好领袖。我们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行动听华主席、党中央指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艰苦奋斗，奋发图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发展大好形势，

争取更大的胜利。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以来，我们召开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大会来推广大庆的经验，还是第一次。由于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过去多次想开这样的大会，都没有开成。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又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扫清了工业学大庆的障碍。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是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大胜利。

我们这次会议，是全国工业战线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参加会议的，有大庆油田的代表，有大庆式企业、学大庆先进企业和先进集体的代表，有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的代表，有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企业的代表，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和部分县的负责同志，有中央、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农业战线的红旗大寨和解放军硬骨头六连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到会代表共七千人。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工业战线上的一次群英大会。

我们这次会议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全党、全国工人阶级，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把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阶段，普及大庆式企业，为尽

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是贯彻落实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走向天下大治的重要部署。

大庆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大庆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面贯彻执行“鞍钢宪法”，走出了一条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根本对立的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正如敬爱的周总理曾经指出的，大庆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认真推广大庆经验，普及大庆式企业，让大庆经验在全国遍地开花，就能够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把每个企业都建设成为反修防修的斗争堡垒；就能够大大加快我国工业发展速度，更好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促进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能够更好地贯彻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大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现在苏美两霸都在疯狂地扩军备战，世界大战总有一天要打起来。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必须争时间，抢速度，大大加快工业发展的步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要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华主席最近几次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和他们的那条极右路线，把被他们搞乱了的

思想进一步加以澄清。要认真学习推广大庆的经验，表彰学大庆的先进单位、先进人物，制订出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规划和措施。要把大庆的经验真正学到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联系我们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揭露矛盾，找出差距，象大庆那样坚持继续革命，用大庆精神学大庆。

华主席、党中央对这次会议十分关怀、十分重视。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对我们寄予很大期望。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这次会议必将开成一个朝气蓬勃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之后，我们要以新的战斗姿态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作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同志们！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指引下，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在今年内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抓纲治国的战斗任务，一定能够实现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一定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和第五个五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几十年内在经济上超过美国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把中国这个世界革命根据地建设得更好，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原载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评论员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究竟是什么人？“四人帮”究竟是一伙什么东西？

长期以来，他们开动了一切宣传机器，利用了所有舆论工具，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吹嘘他们不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文艺革命的“旗手”，而且有一部“出身清白”、“一贯革命”的光荣历史。现在，真相大白了。六个多月来，党中央遵循毛主席教导的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对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政治历史进行了认真的严肃的审查。根据大量的确凿的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总之，他们是一伙反革命，而张春桥和江青还是由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双料反革命。“四人帮”就是由这样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早在三十年代初，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张春桥，在济南上中学时，就充当国民党特务，进行反共反革命的罪恶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使六名革命青年受迫害，其中一名牺牲在狱中。一九三三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骨干分子。一九三五年五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导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九三七年秋，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的指令下，伺机潜入我根据地，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接着又采取隐瞒反革命历史和反革命家庭社会关系，欺骗党组织的手法，钻进了共产党。

地主家庭出身的江青也是在三十年代开始她的反革命政治生涯的。一九三三年二月她加入共产党，不久失去了党的关系。一九三三年秋她又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十月，江青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不久自首叛变，从狗洞里爬了出来。接着她也结识了崔万秋，来往频繁，关系密切。崔万秋曾在反动报刊上对她进行肉麻吹捧。江青大演“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积极参加了“购机祝寿”的活动，为国民党效劳，向蒋介石献媚。一九三七年，她与另一个叛徒订立攻守同盟，混入延安，隐瞒自首叛变的历史，由这个叛徒出面做了假证明，钻入党内。

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一九三四年叛党出狱的，以后就在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领导下充当文化特务。姚文元小时就深受徐恩曾和他的老婆叛徒费侠的喜爱，当了徐恩曾这个大特务头子的干儿子。以后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直到徐恩曾夫妇逃到台湾。一九四八年上海解放前夕，姚文元隐瞒了他父亲的叛徒、特务身份和地主、资本家家庭出身，隐瞒了自己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混进党内。解放后，姚蓬子坚持反动立场，反共反人民，于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姚文元竭力包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利用窃取的权力，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勾结王洪文、张春桥千方百计包庇姚蓬子，使他得以逃避党和人民群众的审查。长期以来，姚文元一直同姚蓬子保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一九六九年姚蓬子死后，姚文元还继承了姚蓬子除存款外的全部家产。“四人帮”的党羽所大肆鼓吹的所谓“姚文元道路”，就是这么回事。

王洪文虽然出身劳动人民家庭，参加过军，当过工人，但他在部队和工厂时就表现不好，作风不正。他不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改造世界观。在上海时经常和一些四类分子吃吃

喝喝，称兄道弟，流氓习气严重。文化大革命中，王洪文在上海拉了一帮“小兄弟”，搞特务活动，结帮营私。特别是他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勾结到一起之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恶性膨胀，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疯狂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终于走上了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他利用窃取的职权，大量贪污盗窃，挥霍国家财产，生活腐朽糜烂。王洪文是一个吸工人血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一个正在走的走资派。

这就是号称“左派”、“激进派”的王张江姚的真实面目。

“四人帮”崛起和覆灭的历史又一次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越是取得胜利，阶级敌人越是要钻到无产阶级内部来，采取“从内里蛀空”的战术。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其真象掩盖起来。

“四人帮”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在“抓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大搞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下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于他们来说，革命的口号不过是他们搞反革命的一种策略，一种伪装。几个月来对他们篡夺权力和祸国殃民罪行的揭发和批判，已经把他们的“左派”假面具撕得粉碎，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狰狞嘴脸。现在，揭开他们的老底，弄清他们的过去，对于他们为什么一贯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对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那样刻骨仇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什么不择手段地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内部制造分裂，挑动武斗，全面内战，等等，这一切难以常情加以解释的问题，就更加得到合理的解释了。他们本来就是反革命营垒中的人物，是以推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为任务的。什么“左派”、“激进派”！他们是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派，是彻头彻尾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

“四人帮”把自己打扮成文化大革命的功臣，大造舆论，欺世盗名，捞取政治资本。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们伙同林彪反党集团及其主要成员陈伯达等人，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搅乱阶级阵线，混淆两类矛盾，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以便他们浑水摸鱼，乱中夺权。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干扰破坏造成的。他们那里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功臣”！他们是窃取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扒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四人帮”自称“站在先进分子一边”，“依靠造反派”。他们所谓的“先进分子”和“造反派”是些什么人？他们网罗了一大批新老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出卖灵魂的无耻文人、打小报告和告黑状的投机分子、牛鬼蛇神、流氓阿飞、社会渣滓。他们把这些人封为“反潮流”的“先进分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对于这些人，不是党员的，突击入党；没有当官的，突击提干。他们绝不是那种一般地拉山头，搞宗派，而是建立了一个反革命黑帮。他们有他们的帮中央，有大老板，有军师，有司令，有宣传部长，有舆论工具，有情报系统，有基地，有特务联络据点。他们的黑手插进了中央的一些部门和一些省市机关，他们还搞“第二武装”。总之，他们形成了一个有纲领，有路线，有组织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尽管他们在八亿人

民中只是极其孤立的一小撮，但能量很大，不可低估，其流毒之广，为祸之烈，影响之深，在我党历史上是罕见的。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恶历史的揭发材料，是惊心动魄的。它告诉人们，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怎样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千方百计地打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又是怎样采取阴险狡诈、凶狠毒辣的手段掩盖自己反革命的真面目，钻进了党的领导核心。它还告诉人们，“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扭转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极为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确确实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揭露了一批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在斗争中不断地纯洁了我们的队伍。这是基本的方面。但是，也确有极少数伪装得很巧妙，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长期没有被我们识破。这种事实，过去有，今后也还会有。这反映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隐蔽得十分彻底，终将被我们党和人民群众揭露出来，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利用窃取的权力，与林彪、陈伯达一伙相勾结，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罪恶历史。他们秘密转移、大量销毁他们反革命历史的罪证。他们还秘密组织人，伪装红卫兵，查抄知情人的家，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秘密逮捕知情人，长期关押、残酷迫害，直到杀人灭口。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大量的人证物证还是找出来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四人帮”那些毁灭罪证的伎俩，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党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证明任何伪装的反革命要搞垮我们这个党都是痴心妄想，证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无比正确，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实践的意义重大深远，证明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不可战胜的，证明我们党不愧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尽管王张江姚“四人帮”已被打倒，但是我们要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要把“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全部揭发，把“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谬论彻底批臭，把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件件、一桩桩查清，任务还是很艰巨的。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查清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人和事，绝不能手软，坚决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通过抓好揭批“四人帮”这个中心任务，促进生产，把各项工作带动起来，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和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广大群众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激发起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组织起来，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让我们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抓纲治国，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把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辅导材料

名 词 解 释

①

为了帮助我院革命师生员工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从本期起，我们将陆续刊登军政大学政治资料室编写的名词解释，供同志们参考。

编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三页——指《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次，下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一九四九年六月在北京(当时称北平)召开筹备会，同年九月举行了第一届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国家根本大法，组织了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后，它不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但仍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反对国内外共同敌人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发挥作用。

在这以前，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我们党同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曾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举行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一般称为旧政协。那次会议，通过了一些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决议。那些决议后来都被蒋介石所撕毁。

民主党派(第三页)

指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这些党派和团体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这些民主党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继续参加了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推动其成员和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人们进行自我改造，为社会主义服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第四页)

简称“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的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它在当时曾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这个纲领总结了过去人民革命的经验，特别是人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为全民所有，实行土地改革，保护人民民主权利，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这个纲领也确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国家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和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各方面的基本的政策。

辛亥革命(第五页)

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一九一一年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朝廷的革命。由于这一年旧历是辛亥年，在历史上就叫它辛亥革命。该年十月十日，一部分新军在当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的策动下，起义于武昌，其后各省亦相继起义，清朝的统治很快即土崩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次革命是经过资产阶级和农民、工人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同盟而取得胜利的。但由于领导集团的妥协性，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并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因而政权落到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手里，使革命遭到失败。

人民英雄纪念碑(第一一页)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民族解放运动中牺牲的革命先烈，通过了在首都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当天下午六时，毛主席亲自率领全体政协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的奠基典礼。伟大领袖毛主席亲笔为纪念碑题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碑文是毛主席亲自起草，周恩来总理书写的。纪念碑工程于一九五二年“八一”建军节正式开工，于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完成。

陕甘宁边区(第一二页)

陕甘宁边区原为一九三一年以后在陕北革命游击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成为革命的中心根据地。一九三七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改名陕甘宁边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相接的各一部分地方。当时中共中央就设在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

通货膨胀(第一七页)

通货就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通货膨胀是指投入流通中的货币(主要是纸币发行量)过多，大大超过流通中实际需要的数量，从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一种现象。

通货膨胀是资产阶级国家掠夺劳动人民的重要手段。我国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进行反革命内战和加紧对中国人民的掠夺，恣意滥发纸币，结果造成长期恶性通货膨胀。据统计，从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的十二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增发了一千四百多亿倍，而同期物价却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达到古今中外罕见的程度，结果使得广大人民的生活陷入极端穷困的境地，并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

公 债(第一七页)

公债是国家筹集预算资金的一种方式。公债的性质取决于发行公债的国家的性质。在资

本主义国家，发行公债是弥补国家预算赤字的一种主要手段。它名义上是向人民群众“借债”，实质仍然是变相的征税。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财政预算的基本方针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国建国初期，也曾发行过公债，它是在人民群众的收入逐步提高的前提下，征集他们手中一部分资金，以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公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债性质是完全不同的。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一九五九年以后已停止发行公债，并于一九六八年全部还清过去公债的本息。

半封建富农 资本主义富农

(第一三页)

中国的旧式富农，带着浓厚的封建性，多兼放高利贷和出租一部分土地，雇工条件也带有封建性。这种富农，当他们出租土地的数量，超过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时，就称为半封建富农或半地主式富农。

资本主义富农和半封建富农不同。资本主义富农不用或很少用出租土地收取地租或放高利贷的办法，而完全或者基本是靠剥削雇工(长工、短工、季节工、日工等)的剩余价值发财致富。

土 地 法(第一四页)

这里是指我们党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共中央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当时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就是根据这个大纲进行的。其中有些规定(如平分土地的办法)，在以后执行过程中有一些改变。全国解放后，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开始，我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一九五〇年六月公布实行，代替了土地法大纲。

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第一八页)

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根据解放初期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的任务。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改变了一九四七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的规定，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即仅在特定条件下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对富农的其余土地一律不动。这是符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因为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的情况(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生死斗争，胜负未分)完全不同了，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这样做，有利于更加孤立地主，保护中农，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使土改的打击面由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八左右，减少到百分之三至四。这个政策，在当时对狠狠打击敌人，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有利的。土改以后，实际上富农经济削弱了。在农业合作化实现以前，我党采取了限制富农剥削的政策。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农业合作化的实现，最后消灭了富农经济。但是，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还存在。富农和地主一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